

# 抗拒上帝的信仰者

## ——周作人书话对基督教的选择和接纳

赵普光

**摘要:**周作人是现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书话作家。他的书话作品表明,在其阅读视野中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精神占有重要的部分。致力于新文学理论建构的周作人,在对宗教的选择接纳时,最看重的是其中倡扬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成分。这是他汲取外来文化时的参照,同时这种选择也会影响和促使他阅读兴趣和关注重心的形成。其间二者又发生着复杂纠合与变异。

**关键词:**周作人书话;基督教;个人主义

**作者简介:**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中国书话史研究”(10CZW06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09YJC751046);中国博士后基金(2012M511710)。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6.05.012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如果说胡适是从语言形式层面为文学革命实现突破,周作人则潜于思想层面,致力于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其“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提出与完善,“自己的园地”的开拓与耕耘,无不受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周作人书话作品表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精神在他的阅读视野与知识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致力于新文学理论建构的周作人在对宗教的选择和接纳时,最看重的是其中倡扬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成分。这是他汲取外来文化时的参照,反过来这种选择也会影响和促使他阅读兴趣和关注重心的形成。而基督教文化是如何对周作人文学理论的酝酿建构起作用的,二者之间又发生着怎样的复杂纠合与变异,则是本文考察的重点,并且这一考察是借助书话进行的。

现代书话是探析五四时期人们接受中西文化影响的具体途径。周作人是极重要的现代书话家<sup>①</sup>。有幸处在东西文化交汇的五四时期,周作人的阅读视野中宗教占有很大的部分。所以从周作人大量的书话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周作人对宗教的选择与接纳,及宗教意识对其文学观建构的影响。

周作人书话中有多篇谈及宗教典籍,尤其是基督教典籍,如《〈圣书〉与中国文学》《〈旧约〉与恋爱

<sup>①</sup> 关于现代中国“书话”的概念与文体特征,我在此前有过系列论文论及,请参看拙文《论现代书话的概念及文体特征》,《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论书话的现代文学史科学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关于周作人书话的特点、创作概貌,限于篇幅此不赘,请参看拙文《从知堂到黄裳:周作人书话及其影响》,《福建论坛》2009年第1期;《文体与人:论周作人对书话的经营》,《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诗》《关于读〈圣书〉》《佛经》等。其中《〈圣书〉与中国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周作人对基督教的接触至迟是从他在南京求学期间开始的<sup>[1]395</sup>。直到晚年，他还曾多次在书话中提及圣经及基督教的故事。周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在五四一代作家中是较为突出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树立起了周作人作为新文学理论先导者与杰出批评家的形象。”<sup>[2]31</sup>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其人道主义思想，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萌发与确立又是与其对基督教文化意识的接受有关。从其书话中可清晰地看出思想演变的脉络。

周作人以其特有的敏感早就认识到“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是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sup>[3]338</sup>基督教文化对“人”的肯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圣经》公开承认和宣扬人的尊严。从文学的角度看，圣经中描写了真实的、历史性的人物，这些人物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按照圣经的思想，灵魂的得救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因为被接纳到天堂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sup>[4]20</sup>应该指出的是，《创世记》告诉我们上帝在创造万物后的第六天创造了人，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无疑在暗示“人”的重要、独特与高贵。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sup>[5]1</sup>在上帝创造物中惟有人与上帝本人酷似。这句话意味深长，上帝是全能、永生的，是智慧、理智、创造力的化身，那么人也具有这些美德和特性。人在万物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高贵、权威和智慧，且这些美德都是天赋的，是上帝给予的。从而这就使得个人独立自由，维护作为人的尊严、保持人格、尊重个人价值成为必然，也为周作人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周作人不是基督徒，他对个人主义的维护并不是完全直接的来自基督教的信仰，然而基督教在此方面却与周作人的观点很好的契合，从而决定了周作人选择和接纳基督教文学。在周作人的书话中，他多次提及并倡扬圣经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他在1925年2月14日的《京报副刊》上给青年人开列出的十部书中就有《旧约》<sup>[3]52</sup>。这都和周作人对个人独立、自由的坚守有关。他之所以明确反对1922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原因。

## 二

周作人是一位清醒的“爱智者”，理性主义是其思考问题的原则。与理性静观恰好相对的是，信仰是一种意志活动，具有狂热的非理性的特点，其所有判断都是基于上帝/神这一不证自明的前提。宗教信仰是一种情感和意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理性。所以历史上，宗教（还有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群众性崇拜）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盲目与狂热的病症，结果反而取消了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对此周作人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多次声明自己的非基督徒身份，声称自己“对宗教没有什么研究”。这一有意的行为，显露出周作人对宗教有限度的选择：限定在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维护的范围内，“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sup>[6]</sup>。

周作人对宗教的狂热一直抱有高度的警惕性，自称怀有“宗教之恐怖”的情结<sup>[7]545</sup>。同时周又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较早自觉认识探求宗教思想并接受其影响的人，可见周氏对宗教的接纳上有功利性的选择，即用文学的标准与眼光去看待基督教典籍。换言之，周作人了解进而接纳宗教的因子是为了将其引入并服务于新文学思想的建设。所以我姑且不妨将周作人称为“拒绝上帝的信仰者”。正是基于此，他对宗教有着特别的感受：（《圣经》）“一方面当作文学作品来看，也是很有益的，特别是《旧约》里的抒情和感情部分，如《雅歌》《传道书》和《箴言》等”<sup>[3]395</sup>。谈及佛经时，他还说：“我这里所说的是读佛经，并不是念佛诵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固然是教中的圣典，同时也是一部书，我们把他当作书来

看看,这也会于我们很有益的……佛经里的故事……更多文学趣味,我劝人可以读点佛经,就是这个缘故”<sup>[3]106</sup>。类似于“六经注我”的方式,周作人这种清醒、明确与功利的原则决定了他对宗教的吸收与接纳一直在抗拒信仰遁入理性间彳亍,这也使得我们通过周作人书话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其新文学理论建构与宗教观念间的对应与联系。与“神学家从他所遵循的圣经原则,从他对世界创造的信仰接受了指示,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从哲学上、本体上提出问题”<sup>[4]47</sup>不同的是,周作人是在着力于思考传统“载道文学”之外是否从宗教中可以找寻出一种建构全新文学思想的途径,这种途径将更加密切地有效地与建构全面理知的“人”相联系起来。

周作人在圣经与中国文学之间找寻基督教精神与形式的联系。与此相应的,他同时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发掘基督教对中国国民性的改良作用,通过建构“人的文学”的理论体系以期实现“立人”的目标。其出发点如周作人自己所言的:“中国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所以政治上既失去了独立,学术文艺上也受了影响,没有新的气象。”所以周作人认为“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sup>[8]308</sup>。尽管周作人认识到并坚持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对于改良民智人心的重要作用,但他对是否能真的达到目标信心不足,有所保留,“对于一切提倡不免有点冷淡了”<sup>[8]310</sup>。

### 三

周作人书话多次倡扬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关于物质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强调人的灵与肉的二元统一:“人类的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sup>[9]11</sup>。在性爱婚姻方面,他提倡以男女平等、自然恋爱为根据。在基督教义中,既然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人是智慧、理性的,那么人的合理欲求等天性也是应该受到尊重和肯定的。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被上帝创造出来后,在各种飞禽走兽中未发现适合自己配偶的,认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于是上帝为他创造了夏娃。亚当曾用诗表达对夏娃的颂赞: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sup>[5]2</sup>

可见只有女人才能分享他的统一性,而且男人和女人显示出相同的本性及他们对于善恶的同等的接受能力,这表明了男人与女人的相互依存及平等关系。周作人较早的关注妇女问题,力倡男女平等,如他早在1904年5月的《妇女杂志》上就曾发表《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呼吁女性“脱依附之性。”男女平等、男人女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等思想构成了周作人个人主义、个性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督教看来,人类的婚姻是上帝所应允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sup>[5]2</sup>。亚当、夏娃的结合,暗含着两层寓意:一是男女之间的信任、爱慕及情感的依恋(灵);一是两者间肉体的结合(肉)。男女之间正当的欢爱与愉悦是为上帝所应允。基督教的这种婚姻爱情观在《圣经·雅歌》中有着重要的体现。《雅歌》中描写的爱情是性爱,这种产生于男女之间的爱包含着强烈的肉欲成分。从《雅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性间肉体的相互吸引是上帝律法所认可和规定的,在这一范围内,性爱应起到一种美好而正常的作用。与动物的本能不同,所罗门与女子的爱情具有人类之爱的高雅,使人高尚。更重要的是双方的结合是发生在习俗婚礼之后的,无疑《雅歌》中对浪漫性爱的表现巧妙而有分寸,虽然没有对男女主人公的性关系作具体的描绘,却让人意识到浪漫爱情(包括性爱)的美好、神圣与魅力。所以有人曾言:“基督教对于婚姻爱情的赞颂,超过了其他宗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爱情的诗篇,无不

出自基督教徒之手。”<sup>[4]255</sup>在周作人的书话里，他对《雅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其在文学和人性上的重要价值。周作人曾引用美国神学博士摩尔的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美国神学博士摩尔（G. F. Moore）在所著《旧约的文学》第二十四章内说：“这书（指《雅歌》）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在一世纪时，这书虽然题着所罗门的名字。在严正的宗派看来不是圣经；后来等到他们发现——或者不如说加上——了一个譬喻的意义，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才将他收到经文里去。”这几句话说得很是明瞭，可见《雅歌》的价值全在文学上的，因为它本是恋爱歌集……我们不承认男女关系是不洁的事，所以也不承认爱与妒为不好。“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sup>[3]343</sup>

这段文字出自《〈旧约〉与恋爱诗》一文，发表于1921年的《新青年》8卷5号上。最迟至此周作人已形成了自己看待和评价恋爱诗歌的观点。

这就为他以后评论情诗以及描写性爱、性心理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先在的条件。1922年，周作人分别在《晨报副镌》的10月12日和11月1日两期上发表了《情诗（谈〈蕙的风〉）》《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再谈〈蕙的风〉）》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情诗观。这两篇文章不仅是为汪静之的《蕙的风》作文学上的学理辩护，更是他对人的自然天性合理欲求的维护。所以他说：“我们对于情诗，当先看其性质如何，再论其艺术如何。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褻；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可见，在周作人对宗教的选择接纳中，他最看重的是其中倡扬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成分。这是他引入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参照系数，同时反过来这种选择也会影响和促使他阅读兴趣和关注重心的形成。在他的阅读视野里，有关两性、生物和自然等知识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如他的《二十五年我的爱读书》<sup>[3]99</sup>中列举的诸如《Men and Women》等书目。他在书话作品中还曾很多次地提及《性的崇拜》《爱的艺术》《爱的成年》等，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也正是基于此，周作人为郁达夫的《沉沦》正名，为湖畔派青年诗人辩护。

“爱”的哲学是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爱”人亦是基督教义的核心思想之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受难是为人类“赎罪”，背负原罪的人不能自救，而是被耶和华拯救，但人却能爱人、助人、救人。基督教要求信徒要爱上帝、爱人类，如十条戒命的要旨就是感恩，其中自始至终表现着“爱”的主题：“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有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六章）。耶稣在总结旧约律法时告戒人们：“伟大的戒命”是“你要爱你的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其次是爱人如己。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对此，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表明了他对基督教“爱”的思想的肯定，并认为这种“爱”的思想是“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sup>[3]339</sup>。然而与基督教的“爱”不尽相同的是，在周看来，人道主义之爱首要的和本质上是“爱己”——自我之爱。按照他的逻辑是：爱己——爱人——爱上帝。故而他在《人的文学》中说：“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主义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人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又回到了他的“立人”思想和改良民智人心的初衷上去了。

如前所述，周作人对基督教的选择和接纳与其新文学理论建构的关系在其书话创作中有迹可寻。通过对其书话作品的爬剔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间的联系，同时也可窥见周作人宗教思想选择和接纳过程中他那颗躁动不安、矛盾徘徊的心灵。理想的慰藉与现实的噬咬交替撞击着他并不坚强、难免寂寞的灵魂。



思想的驳杂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这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难免寂寞而又不甘安分的心使之无法达到宗教要求的静穆、沉静的境界。传统的潜因与气质,对个人的坚持和固守更让周作人对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引入与选择,发生了很大的错位与缺失。完整的基督教个人主义应包括自爱与献身的双重取向:既有对上帝的信仰对理想的狂热坚定,又强调自我的能动。而周作人只是择取其中的一个向度,这就导致他身上的矛盾与统一:既尊重并主动地接纳基督教,又坚定地拒绝上帝。这一复杂独特的心态成就了周作人的生命的驳杂与升沉:他的人格在个性主义中升起,又最终在爱的缺失中沉落。

####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 [M]. 香港: 三育图文公司, 1974.
- [2] 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3] 周作人. 知堂书话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4] 勒兰德·莱肯. 圣经文学 [M]. 徐钟, 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
- [5] 圣经 [M]. 南京: 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1998.
- [6] 周作人. 思想压迫的黎明 [N]. 晨报, 1922-04-11 (1).
- [7] 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第一集)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 [8] 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 [9] 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0.

## A Believer Who Resists God

### —The Choice and Acceptance of Christianity by Zhou Zuoren

Zhao Puguang

**Abstract:** Zhou Zuoren was an important writer of remarking of books in modern China. His works demonstrate that religion, especially Christianity culture and spirit plays a great part in his reading horizon. Devo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literature system, Zhou Zuoren put emphasis on elements of humanity liberation and individual freedom when chose and accepted a religion. These are his references when absorbing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likewise influenc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his reading interests and focuses. There are complicated rally and variation between them.

**Key words:** remarking of books by Zhou Zuoren; Christianity; individualism

(收稿日期: 2015-06-22; 责任编辑: 沈秀)